

哲学问题 文化哲学

WenHua ZheXue ZheXue Wen Ti [德] 卡西尔/著

西方学术思想经典(文库)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西方学术思想经典

文化哲学·哲学问题

作 者 [德]卡西尔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 编 130021

开 本 850 × 1168 32 开

印 张 162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601 - 2858 - 0/G·364

定 价 (全套 15 册)456.00 元

目 录

文化哲学

导论 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	1
第一章 人文科学的对象	32
第二章 事物的感知和表达的感知	75
第三章 自然概念与人文概念	105
第四章 形式问题与原因问题	144
第五章 “文化的悲剧”	164

哲学知识

第一章 现象与实在	197
第二章 物质的存在	207
第三章 物质的性质	216
第四章 唯心主义	225
第五章 认知的知识和描述的知识	233

第六章	论归纳法	245
第七章	论我们关于普遍原则的知识	254
第八章	先验的知识如何可能	264
第九章	共相的世界	272
第十章	论我们关于共相的知识	281
第十一章	论直观的知识	290
第十二章	真理和虚妄	297
第十三章	知识、错误和或然性意见	308
第十四章	哲学知识的范围	317
第十五章	哲学的价值	327

文化哲学

导论

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

文化哲学肯定是我们目前在哲学体系中所区分的全体分支中最有疑问和最富争议的一门学科。目前，这个概念远未严格界定，它的含义也未被普遍赞同。不仅对这个基本的定义问题缺乏一个牢靠的可以公认的解答，而且，对哪些问题对文化研究是有意义的和切题的也更缺少一个基本的理解。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部分是因为对于文化的哲学研究是最年轻的哲学学科，不像其他学科，它没有一个经过若干世纪发展的牢固传统。前人已将哲学划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三大部分，从那以后始终如此，几无改变。康德还承认，这种划分是正确的，断言它完全符合事物的性质，是不容修改的。〔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Werke* (Berlin: Bruno Cassirer, 1912—1918), IV, 243.〕〕

只有现代思想家才逐渐认识到，除逻辑学、伦理学、物理

学而外，哲学探索还存在其他不同的方式和方向。无疑，在这一点上，文艺复兴时代标志着哲学意识的最初的明确的演进。我们看到，经过 16 世纪和 17 世纪，一个新的哲学问题趋于成熟，它诞生于狄尔泰所谓的“文化科学的自然体系”。但这种“文化科学的自然体系”将一门未来文化哲学的萌芽隐藏在自身中，自己依然寄身于业已建立的哲学系统内，仿佛无家可归。新的、刚开始萌发的东西就这样受阻和被抑制了。

然而，这种抑制并非仅仅是表面的或偶然的現象。它来自于在现代精神诞生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最为强大的实证的生產力量。正是数学和数理自然科学塑造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理想，除了几何学、解析学、机械学，似乎再无任何其他真正严谨的科学探索的领域了。因此，对哲学理性来说，如果文化世界向来被认为是可以进入的和自明的话，如果它不再处于神秘黑暗中和神学传统的桎梏中，那么，它也必然就像物理世界一样，是清晰的可被数学公式化的。凭借这一指南，斯宾诺莎试图填补伦理学和几何学之间缺少的那种体系的一致性。人类世界不再是一种“国中之国”了。从此，我们仿佛将人及其产品仅仅当做线、面、体来看待与描述。斯宾诺莎的同一性学说具有严格的方法论意义，是形而上学一元论，它最终要求这样对待伦理学问题。因此，凭借一定的哲学知识，目的性概念必然被否定和取消，因为，如果我们追溯它的起源就会明白，既然真理只能凭借纯粹数学的和法理的概念来获得，那么这种学说不过是一种神人同性论的谬论与曲解。

继起的思想深受斯宾诺莎方法论的一元论的影响。18 世纪

末叶的斯宾诺莎思想被重新唤起，对同一性的要求导致一个重要的决定性主题的产生。正是由此，谢林得以将其思想与斯宾诺莎直接相联系。他公开声称，他的同一哲学只是要完成斯宾诺莎最初用醒目线条勾勒的思想。在谢林 1801 年写作的《我的哲学体系阐述》一书中，我们看到下面的一段陈述：

哲学的性质就是探究事物本身所是的东西，即它们本身是无限的绝对的同一。因此，真正的哲学在于证明，绝对的同一（无限性）不能疏远自身，而且就其自己来说，它必然是无限性自身，在先前的所有哲学家中，只有斯宾诺莎承认这个论点，尽管他未能完全证明它，也未能足够清晰地表述它以避免它被普遍地误解。[参见谢林：《我的哲学体系阐述》。[Friedrich von Schelling, “Darstellung meines System der Philosophie,” *Sämmtliche Werke* (Stuttgart and Augsburg: J. G. Cotta, 1856—1861), IV, 120.]]

但是，尽管谢林自信他的学说与斯宾诺莎的完全一致，但他不可能拣起恰好是斯宾诺莎放弃的问题。的确，他也为精神与自然之间的绝对同一做了争辩，而且，他认为，这个等式中之自然概念一项已经历了根本的转换。谢林说到自然，他不是说一种存在通过广延与运动机械地创造自己。他认为，自然并不是几何排列和机械原理的简单总和，而是一个结构与力量的有机整体。他认为，数理物理学堕入一种单一的抽象，一种影像。自然只是在有机事物和有机结构的形式中才具有真正的实

在性。哲学思想将其自身从存在的这个最初阶段提升到精神的真实世界中，提升到历史和文化的世界中。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从教会我们时空法则、事物与力的法则的理论哲学阶段，经由现实知觉的阶段到达最高的阶段——审美直觉的阶段。“自然是一首披着神秘奇异外衣的诗，假如谜底只能自己显露，它会告诉我们，巧妙伪装的精神漫游，在寻找自身时又逃避自己，因为，经过知觉的世界，遵从知觉的命令，它凝视着那片我们透过朦胧的雾色渴望到达的幻想的土地。”[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Schelling, “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Sämmtliche Werke*, II, 628.〕]

以浪漫主义精神表现出来的文化哲学在谢林体系的导引下发展起来。它的强大与柔弱都在于它想用简单的原理阐释和用一个简单的观点领悟各种意识表现：最初出现的神话幻想；民间传说和诗歌；最后是思维的最高显示，语言、科学和哲学的最成熟的表达。谢林所谓的“幻想的土地”即严格的逻辑知识领域经常互相影响。这些知识领域不是判然有别的，而是相互交叉的。浪漫主义凭借这种想像力和直觉力创造了它的最高成就。它不仅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自然，而且凭借这种洞察力，它获得了对精神现实的各种形式的大体把握。这里似乎首次昭示了神话、宗教、语言、诗歌、道德和法律的真实而深远的源泉。仅列举艾科恩、萨维尼、雅各布·格里姆、奥古斯特·柏克等人，就足以明白这场运动对确立法律史、语言史和我们古人的知识史起到了什么作用，显示了什么意义。无疑，浪漫主义哲学为这一巨大的科学工作开辟了道路，并以特殊的方式反复

激励了它。

然而，有一个原理是这种哲学不能也不敢以任何严格的逻辑意念去探索的。这种哲学自己就否认了这个问题，因为，一旦提出，它将要揭示那个被浪漫主义基本信条宣称永远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问题。如果它在这里要寻找一个原理，那么它就本身不是一个逻辑原理，而只是一个多少具有神秘性质的出发点。浪漫主义认为，所有精神事物——它们的精神时隐时现——都来源于“人类的精神”。

尽管它使用的是一种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语言，但它也是一种自然主义。因为在这里，历史与文化被认为产生于有机生命的内部。它们不拥有真正的“自主”、独立或内在合法性。这里，它们不再是由一个有机体自发产生的，它们寂静地产生和生长，仿佛种子那样，为了使其变成一棵树，只需将其植入土地，因此，法律、语言、艺术和道德都是产生于民族精神的原始动力。这种寂静与完满的确实性包含了一个寂静主义原则。文化世界不再被认为是一个自由活动的世界，它是命定地存在的。例如，萨维尼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试图将一切法律的演化置于风俗、习惯和共同信仰的基础之上，并将其限于这些范围里。他还强调，真正的法律只能通过这些“平静的内在力量”得到发展。于是，西奥多·利特对以这些形而上学的系统观为基础的观点做了异常清晰尖锐的方法论批判，他在《个人与集体》一书中写道：

有机主义哲学的精彩动人之处就在于，它使用了一种

自明的技巧，在一种梦幻般的植物生存的确实性中有一种从容不迫的运作力量，世界发展过程中一切骚动和内容冲突都不过是一种表层的涟漪，这种哲学的弱点在于，它……承认个人存在的解体，这种理论的静止特征变得十分明显。

[西奥多·利特：《个人与集体：文化哲学原理》。[Theodor Litt, *Individuum und Gemeinschaft: Grundlegung der Kulturphilosophie*, 2nd ed. (Leipzig and Berlin: B. G. Teubner, 1924), p. 153.]]

的确，当浪漫主义遮掩在自然和历史上的面纱被撕成碎条时，它的弱点与危险开始完全暴露出来。一旦求知欲不再沉溺于对生命起源的纯粹知觉崇拜，而要求对生命的理解时，这种情形便发生了。此时，谢林的自然哲学被遗弃，一门用来解释生物现象与“心灵”现象的纯粹经验科学的理想便诞生了。这门关于生命的一般科学（理论生物学）也注定会成为所有历史研究和所有文化哲学的原型与样板。

这一转变的完成在 19 世纪的下半叶，在法国文化哲学中得到最清晰的表现。属于这一学派的思想家从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获得了哲学训练，这一实证主义的基本教程为他们确定了方法与问题。但此时，科学的状况比这些一般哲学假定对他们有更大的影响。他们接触与认定的宇宙观念就是经典物理学的宇宙观念。这门物理学的最高公理就是曾用“拉普拉斯精神”的著名假设分析过的因果性原理。

甚至那些受康德思想训练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也不敢动摇这种解释。在这一点上，奥托·李普曼的一篇异常概括简明的论文是突出代表。在《理论终点——一般科学研究》中，他开头就表示，完全决定论的假设还可以运用到所有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所有研究方法和所有知识方面，在这一点上，道德世界的科学与物理世界的科学不存在任何差别。

无论是星球和原子的运动，还是市场价格和交换率的变化，无论是地质的不断更新与地球的不断蜕变，或是李维的《早期罗马史》中消失了的民俗的重新兴起，无论是人的禀性、决断和行为的变化或海洋潮流和气候的变迁，在任何一种可能的情况下，不同于愚昧迷信思想的理性科学都依赖于一个一般性的假设，即，即使在我们不可深入的那些显而易见的现象中也存在着严格的因果关系，这部分现象与我们在别处一些零星、片断现象所获得的因果关系体验完全一致。然而，要确定这个基本的科学信条与意志的道德自由和思维的逻辑自由之间的一致性却是一个超越经验的困难问题，但是，不管答案是什么，它绝对不能被允许与认识论问题混为一谈。否则，会导致一种外来的分裂的入侵，并只会引起混乱。自由问题在此无立足之地。“不信奇迹”与“完全相信所有现象无例外的绝对合法性”在概念上是相同的或等义的。无须怀疑因果性原理的无条件性、客观性与普遍合理性，上述两者是完全相同或等义的概念。〔李普曼：《理论终点——一般科学研究》。〔Lieb-

mann, *Die Klimax der Theorien, Eine Untersuchung dem Bereich allgemeinen Wissenschaftslehre* (Strassburg, 1884), pp. 87ff.]]

我引用这些论述是因为它们以极其概括和鲜明的方式反映了19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和哲学共同面临的一些基本的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两个研究领域都感到自己面临一个似乎不可避免的抉择。它们或者必须接受“拉普拉斯精神”的理想，或者必须承认、相信奇迹。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认识论哲学家与批判哲学家必须决定天平倒向哪一侧。

当然，当我们今天读到李普曼的这些话时，我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受。这些话的写作离今天不过半个世纪左右，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几乎经历了一个整体的改变。今天，没有一个认识论研究者再敢于用李普曼的形式来倡言普遍决定论原理。因为他会立即发现自己面对着由现代理论物理学的发展而提出的所有那些方面的严重问题。我不认为这些问题给因果性原理带来了什么真正的威胁，同样，也不认为它们迫使我们必须承认非决定论。不过，它们要求我们重新考虑因果性普遍原理意味什么和不意味什么。但我不想在此处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别处已做了详尽分析。[参见我的《现代物理学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因果性问题的历史及系统研究》。[See my *Determinism and Indeterminism in Modern Physics,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Studies of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6).]] 在这里我仅仅关注一般决定论原理对人文主义后来的发展及建立一门文化哲学的尝试所具有的

影响。

法国的文化哲学家首先从事这一问题研究，虽然看上去他们把严密的物理学作为样板，但他们既不是数学家又不是物理学家。他们的兴趣转向另一方向。他们的基本立场不是根据牛顿或拉普拉斯的宇宙观而是根据达尔文与斯宾塞的宇宙观。而且，在谢林及浪漫主义的自然哲学那里，自然与文化被合在一起，仿佛跌落到等同物的地位，从而两者都服从于一个共同规律，即进化的基本规律。但是，这种向等同物跌落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可以说，它现在的意义在于它变成了反向交换的媒介。因为，存在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差别不再按浪漫主义哲学那样通过自然的精神化来被沟通，而是通过文化的实体化来被沟通。因此，如果要建立一门真正的文化科学，不能仅靠必然引路的形而上学或神学，而且还要靠化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最后，从直觉上说，还包括有机论，但它必然落到机械论的境地，并整个儿消失在其中。

这一思想流派的首要人物之一是圣·伯夫，他不仅拥护这一派的思想，而且富有天才地进行了研究。他不是一位哲学家，也无论如何不能被认为是某一特殊领域的有体系的合格的科学家。他的天才不在于掌握一般理论和基本原理，而在于掌握纷繁驳杂的个别知识，在于对细枝末节的东西的悟性。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他展现了全部新奇的财宝。他对法国思想界的影响十分巨大，以至阿纳托尔·弗朗斯称其为 19 世纪的博学天才。他宁愿将自己的著作标榜为对精神世界的自然研究，他企图当一个“人类精神的自然主义者”。〔参见欧文·巴比特：《现代法

国评论家》。[Irving Babbitt, *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 1912).]

圣·伯夫以驾轻就熟的艺术技能和无与伦比的感情实践的东
西被他的著名信徒希波莱特·泰纳 [希波莱特·泰纳 (1828—
1893), 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文艺批评家和心理学家。——
译者注] 首先发展为一种固定的、完备的方法。泰纳首先采用
了一种被认为对所有未来文化历史分析都有效的固定因果图式。
他发明用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来解释所有个别现象。一旦
我们正确而牢固地把握了这三个基本要素, 我们就能完全理解
文化史的各种问题。似乎只要我们将这些要素结合起来, 我们
就能像施展魔术般地将笼罩在一切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上的光
晕一扫而光。不能否认, 泰纳在其杰作《英国文学史》和《艺
术哲学》中成功地施展了这一魔法, 他不遗余力地集合无数个
别事例用以阐明某一时代的特征和文化氛围。但是, 他并不遵
循什么特殊的有步骤的计划收集资料。某时某地很碰巧地发现
了资料, 就收集之, 不加批判地采纳之。对他来说, 一件奇闻
逸事像一段历史记述或其他文字材料同样有价值。一篇对教谕
的评注、一首当时的讽刺诗或一篇传记都被无所顾虑地接受并
在需要的地方引用之。泰纳用这些个别但富有特征的笔触 (他
称之为“任何微小的有意义的事实”) 勾画出他的图画。

但是, 泰纳很明白, 仅靠个别事实的堆砌是绝不可能建立
一种有坚实基础的科学理论的。他认为, 一种理论的最后建立
依赖建构和演绎。有了经验材料的筛选, 才能寻找产生这些材
料的原因。泰纳认为, 只要我们依然坚信实证主义的基本原理,

要找到这些原因是并不困难的。与其将这些原因视为超验的，不如将其视为纯粹内在的。与浪漫主义哲学所说的超个别的统一体和整体不同，它们不属于超感觉的世界，它们是一些形成和支配物质世界的同样力量。如泰纳在其《艺术哲学》导论中所说的：

我努力遵循的现代方法现已渗透到所有科学中了，它把所有人类创造物尤其是艺术品仅视为事实与结果，它们的特征将被暴露，它们的原因将被追寻。因此，科学既不下判断也不做辩护，它的任务仅在于确认和阐释。文化科学必须使用与植物学同样的方法，在植物学研究中橘树、梨树、云杉和桦树都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的确，文化科学与应用植物学的形式没有什么不同，但它研究的不是植物，而是人类的成果。因此，它属于那种普遍的运动，今天，在这种运动中人文科学（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正在相互接近，前者开始取得与后者同样的确定性和进展。

因此，将一组事实归类于物理的，将另一组事实归类于心智的或精神的，也许这不过是指明了一种固有的差别，至于说到我们对这些事实的理解方式，这种分类就全然无意义了。因为，我们对这两者的单个事实都不关注，而仅关注它们的因果关系，这对两者有同样的意义和同样的说服力。

欲望、勇气和诚实与消化、肌肉运动或动物发情完全

一样，都是有原因的。恶和善就像硫酸和糖一样，都是结果，每一个复杂的存在都来自其他更基本的物质的结合，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因此，探究德性的成分就像探究心理构成一样。由一系列全能的普遍的原因产生了事物的普遍结构和现象的最高形态。宗教、哲学、诗歌、工业、技术以及社会和家庭形式不过是事物在这些普遍原因作用下所采用的表征而已。

因此，泰纳能够自豪地说：“今天，如动物学一样，历史学已发现了自己的解剖学，而且，我们知道，为了能回答语文学、语言学或神话学的问题，我们必须转向这门科学的哪一支。如果我们要继续获得新的成果，我们总是不得不在这种（结构）方式中行进。”〔泰纳：《英国文学史》。〔Tain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Introduction, 8th ed.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892), pp. ix ff.〕〕

普遍决定论可以在三个不同的方向上用三个不同的系统基本假设向前推进。这三个基本假设可分为物理学的、心理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其中第一方面已在法国实证主义者孔德、圣·伯夫、勒南和泰纳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清晰的系统表述。第二方面由当时的施本格勒的文化哲学做了例证。第三方面的代表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精神现象学。

严格决定论的物理学证明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人类世界的各种现象都服从于自然法则，它们是固定的自然条件的自然结果。事物的物理状态、土地性质、气候、遗传法则和社会

遗产继承性是明确无疑地、全面地决定各种现象的基本因素，来自自我的自发行为不可能突破这些法则重新建构那些因素。当然，即使在这一理论中，自我的活动也不可能完全被压制。因为，自我无论如何矜持，它的活动在进化论中还是占一定的地位，进化论承认和顾及自我的活动，将其放在结构之中。进化论认为，个人的存在并不完全契合于环境，但受制于这种契合，它“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因此它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修改自己。为了表达进化论概念这两方面的含义，孔德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概念“可修改的命运”，这是一个经验的和实证的概念，但应当说，在孔德的封闭形而上学概念体系中也许没有相类似的概念，两者之间有一种矛盾和不协调。〔关于孔德“可修改的命运”概念，参看恩斯特·特罗尔切的《历史主义及其问题》。〔Ernst Troeltsch,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Gesammelte Schriften* (Tübingen: Mohr, 1912—1925), III, 390ff.〕〕

历史宿命论的第二种形式为施本格勒所坚持，我称之为心理学形式。施本格勒声称其历史观远远超出实证论自然主义的狭窄范围。他认为文化不是固有的物理因素的产物，而是固有的心灵世界的显露，它不依赖于什么，无因果关系可言，必须被视为不可简约的事实。我们不能问一种独特的文化起源于何处，因为它的诞生始终属于一个神秘的现象。一旦一颗非凡的灵魂突然“从永久天真的人性开始萌芽的状态中觉醒过来”，文化便诞生了。显然，这种觉醒不是靠自然科学的概念可以说清的，而只能通过灵感来体认。因此，施本格勒认为，文化哲学的真正逻辑不是自然科学而是诗。施本格勒曾论述说：“说到最